

莱顿汉学书系魏晋南北朝研究 现状与汉学方法论综述

Literature Review and Sinological Methodology of Early Medieval China in ‘Sinica Leidensia’

柳依依¹

Yiyi LIU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

College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

Yiyi.Liu@anu.edu.au

摘要 对荷兰莱顿 Brill 书系中涉及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书目进行分类与汇总，重点分析其中高频出现的空间研究、主题研究、记忆学研究与互文四类方法论，由此可获知以莱顿为代表的荷兰汉学研究部分特征，并能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此外，与中国国内同期研究现状进行对比，或可进一步拓展魏晋南北朝文学本土研究的新前景。

关键词 莱顿汉学书系；博睿出版社；魏晋南北朝；汉学方法论

Abstract This paper classifies and summarises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Brill Collection, Leiden, Netherlands, which relates to th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of early medieval China, focusing on four types of methodology: space studies, thematic studies, memory studies and intertextuality studies. In this way, it is feasible to construct a representative pictur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utch Sinological research, represented by Leiden, and to predict its future trends. In addition, it compares these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domestic academia, thus further looking forward to new prospects for studying early medieval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Keywords Sinica Leidensia; Brill; Early Medieval China; Sinological Methodologies

引言

Brill 博睿出版社于 1683 年创立于荷兰莱顿，全称 Koninklijke Brill NV，是一家专注于学术出版的专业出版社。该机构与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联系紧密，于 1730 年成为其指定承印单位，1982 年成为其出版物的指定经销商。时至今日，Brill 仍是一家独立的商业性学术出版社，秉承着国际学术合作精神延续至今。

Brill 图书因其学术价值备受全球学者认可，而其之所以能够被选作本次研究的样本，主要原因如下：首先，莱顿大学始终是荷兰进行中国研究的最主要阵地，Brill 作为其官方合作者、同时也是欧洲大陆一家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出版社，亦较早开始从事相关书籍的出版工作。

收稿日期：2023-09-23

作者简介：¹ 柳依依，澳洲国立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2023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一般项目《英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集海外传播问题研究》资助阶段性成果。

由该社出版的汉学书系（*Sinica Leidensia / SINL*）于 1931 年设立，由国际汉学家委员会编辑，截至 2024 年共出版 165 册，涉及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哲学、语言文学等领域。几十年来，该书系稳步推进了海外对传统中国乃至当代中国的认识。此外，从时段的跨越角度看，其同样较为全面地涵盖了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

其次，该社的汉学研究偏向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由其出版的汉学研究书系中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书籍截至目前共出版近 50 册。荷兰对中国的研究虽经历了阶段性演变，但从早期开始，针对前现代中国——尤其是古典中文、翻译与宗教——的研究，就一直作为重点存在。这部分书籍由田海（Barend J. ter Haar）、柯雷（Maghie van Crevel）编辑，与包弼德（Peter. K. Bol）、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伊维德（Wilt. L. Idema）、宋汉理（Harriet. T. Zurndorfer）学者等合作完成，参与者多是北美汉学家，此番选择在荷兰莱顿进行出版，也说明了该地在这一领域的优势。

此外，在莱顿汉学漫长的发展史中，研究名家辈出。2013 年 12 月，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荣誉教授、哈佛大学中国文学研究院教授伊维德于 Brill 出版《荷兰的中国研究：过去、现代和未来》（*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一书，对部分当代中国研究者的文章进行收录汇总，其中收录了 Brill 出版社亚洲研究部负责人何世泰（Albert Hoffstadt）与莱顿亚洲中心（Leiden Asia Centre）的学术主管彭轲（Frank N. Pieke）等的文章。而向前追溯至莱顿汉学的草创期，真正开启荷兰的中国研究的汉学家施吉德（Gustaaf Schlegel, 1840-1903）便出身莱顿。其继任者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及戴闻达（J. J. L. Duyvendak, 1889-1954）等学者，均为莱顿汉学研究打下基础并导其先路，后者更于 1930 年创办了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该院后来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这些已有的学术积累使得 Brill 汉学出版物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与可信度，也证明了自身的研究价值。

而将视野聚焦于莱顿汉学研究中魏晋六朝这一时期的原因同样出于该期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性。文学史所定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末建安年代，迄于隋朝统一，历时约四百年。在这一时期，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自觉与创作个性化现象尤为突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也相当明显。这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也是古代文学整体研究中的一门重要学科。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学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名化。时至今日，形势虽已有所好转，但大多数人关于这一时段仍保留既有的负面认识，这种认识或深或浅，直接导致了重视程度的缺乏，这对于该时段文学研究难免会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同一时段在国内外遭遇截然不同，“中国古代文学的中古前期”在海外一直受到各地汉学学者的广泛关注，如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 1913-2014）、田晓菲、吴妙慧（Meow Hui Goh）等，相关书写层出不穷（其部分文章或专著亦经由 Brill 发表）。于是，此时将视野转向海外汉学中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通过分析其研究焦点

与方法论，继而同中国目前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互通有无，是有必要的。莱顿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始终持有较高关注度，这一点通过相关书目在书系当中的占比即可发现。这一比例无论较之国内还是较之汉学学者云集的北美，都凸显出莱顿对该时期文学的重视。持久的高度关注使当地的相关研究颇具专业性，这也成为该个案可行性的辅证之一。

本文将尝试对该书系中涉及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内容进行学理性的具体分析，考察其中体现的研究趋势，度量其在学术与出版传播以及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史上的位置，最终同中国国内学界该时段研究进行对比，总结他山之石，或有借鉴之处。

一、莱顿汉学书系中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多维透视

(一) 相关著作归类

该书系中涉及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有七部学术著作，特色各具。首先，研究内容多样，既包括纯文学文本内容，也包括文学发生场所、物质遗迹等客观存在物以及文学倾向、创作过程等多方面；其次，研究方法多元，如空间研究、主题研究、记忆研究、互文研究等。各著偏重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流作家作品，相对更为注重作品中哲学思想的中西比较，注重对作家创作手法等要素及思想内涵进行阐发，从而体现出较强的理论性。

| 体例 | 部数 | 著作 | 出版时间 | 著者 | 主题 | 方法论 |
|----|----|--|---------|---------------------------------|--------------|------|
| 专著 | 4 | 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 Three Lyric Poets of the Yung-ming Era (483-493) | 2003-10 | Richard B. Mather (马瑞志) | 永明体：沈约，谢朓，王融 | 主题研究 |
| | | The Age of Courtly Writing: Wen Xuan Compiler Xiao Tong (501-531) and His Circle | 2012-05 | Ping Wang (王平) | 文选；萧统 | 空间研究 |
| | | Imitations of the Self: Jiang Yan and Chinese Poetics | 2014-11 | Nicholas M. Williams (魏宁) | 六朝拟诗；江淹 | 互文 |
| | | The City of Ye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Landscape | 2020-01 | Joanne Tsao (曹中玉) | 文学场所：邺城 | 空间研究 |
| 论集 | 3 | Reading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Text, Context, and Culture | 2014-12 | Paul W. Kroll (柯睿) 等 | 中古诗歌 | 主题研究 |
| | | Memory in Medieval China: Text, Ritual, and Community | 2018-06 | Wendy Swartz (田菱) 等 | 记忆构建；接受研究 | 记忆研究 |
| | | Considering the End: Mortali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Poetic Representation | 2012-05 | Timothy Wai Keung Chan (陈伟强) | 政治困境中的“死亡”书写 | 主题研究 |

(二) 占比与主题迁移

由于该书系涉及领域较广，且囿于总体规模，很难对某时段的某方面内容作出高精度的研究。其中涉及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书籍虽仅有七册，但在该书系中国古代文学类占比约 16.3%，这相对于该时段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占比高出约 7%，说明这一时段的文学研究在整体的研究与出版领域是获得了一定的重视的。

通过梳理出版的时间轴可以发现，莱顿汉学书系虽设立较早，但真正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学、涉及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时已是在大半个世纪后的 21 世纪初。永明体诗歌成为这部分著作的发端，以整理与翻译的形式呈现。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成为相关著作出版较为集中的阶段，该时段的文学研究多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出现，其中六朝拟诗得到了尤为突出的关注，江淹、阮籍、陆机、陶潜、谢灵运、萧统等成为焦点人物。通过对这些著作关键词的整理可以发现，著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文学史上坐标性的知名文人获得了内外统一的认可，其作品首先被选择进行研究，在这些著作中，较少有非一流、次重点作家作品的存在。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则仅出版了讨论邺城的一部专著。此时研究方法进一步发生了转变，不再围绕单个作家呈圈层式展开，而选取了一个在该时段颇具特殊地位的文学场所作为中心。虽然关键词与切入点都发生了变化，但总体上仍是将讨论文学场所作为跳板，最终依旧将研究重点落在发生于该时段的纯文学创作上。总的来说，在该书系过去二十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尽管研究方法不断变化，但在内容的选择上，文学文本始终是核心重点。

二、方法论分类综述

通过对各著作基本内容的梳理可知，该书系中涉及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对象、方法等均不尽相同。依照不同的体例和研究方法可将其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大类。

（一）空间研究（Space Studies）

空间研究的基础概念来源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提出的“文学场”，亦即“文学生产场（the field of literary production）”，该概念建构在将结构和历史视野辩证统一起来的文学观念上，是一种文学场域化研究——此时，文学场域代表着一处空间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活动在其中发生。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对文学现象的解读需要相应地语境化、历史化，即必须把文学活动置于社会历史的场域空间中进行总体考虑。因此，对文学进行研究也意味着建构一系列“纸上的建筑群”。从这一角度思考文学，也是从空间结构、关系结构等角度考察文学意义的生产过程。

上述著作中，《中国文学景观中的邺城》（*The City of Ye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Landscape*）一书体现出最为鲜明的场域学研究特色，曹中玉选取曹魏时期营建的邺都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空间意义上的复盘与重建。邺城在空间维度上形成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文学场所，却并未留下同其他古都一样明显的历史文化标志。当关于邺城的比喻在时间中移动时，它积累了越来越复杂的表现维度。该著作对纯文学（尤其是诗歌）中作为“不断发展延续的文学主题”的邺——即“邺都诗赋”——进行考察，最终目的在于探究这座城市在较大的时间跨度中是如何被呈现的。在空间观念的指导下，著者以客观存在为切口，通过对该类事物以及文学文本的选择性考察，构建起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空间：共时空间由曹操时期邺都诗赋所呈现的景象

直接构成，重点讨论了以邺城作为庆祝空间的诗作，选取铜雀台和宫苑建筑（terrace & gardens）两个重点意象，叙述与分析邺城是如何发展成为文学想象世界的一部分、成为由权力的短暂性生发出的怀古行为象征的；历时空间则展示了后世文学中邺城的形象流变，突出邺城以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铜雀台这两个意象在魏的伟业消亡后、直至南北朝这一时段中的嬗变过程这条发展线索，重点讨论晋代对邺的描绘与南北朝时期邺的意象流变。从这两个维度上，著者对邺城的历史背景、建设和发展进行了复盘。在空间的构建中，“客观存在”是一项重要元素，它既包括在考古发现中邺城的物质遗留，亦涵盖前曹操时代邺城的历史、城市规划和建筑环境等地理情况，以及后曹操时代邺城的城市变迁。

简言之，该著的空间研究属性一方面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邺城本身即是一处文学场域；另一方面则在于著者在空间建构方面的努力，通过这一行为将邺城妥帖嵌入其中，从而具体、系统地分析文学意义上邺城的内部构成，以及这座都城作为一个坐标在一段文学史上是如何形成、稳定、发展、变化的。

该著的参考文献中出现了不少国内学者以邺城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其绝大部分集中在历史学领域，此外也存在部分使用主题研究法的文章，内容主要围绕由著者择取并在论述中作为例证的几类诗歌题材展开。这些条目说明了该著作部分建立在中国历史学与文学的既有基础上，但著者将二者结合，将文学放入历史空间形成学科交叉，这种特殊性与其在对象选择方面的匠心独具一同构成该著的创新之处。

《宫廷写作时代：文选编纂者萧统和他的圈子》(*The Age of Courtly Writing: Wen Xuan Compiler Xiao Tong (501-531) and His Circle*)是书系中另一部较典型地运用空间研究法的著作，其着眼点放在这一时代的宫廷文化上。“宫廷”本身构成文学发生的场域，王平将萧统与代表其文学观念的总集《文选》作为切入点，将整个梁代宫廷文化——尤其是天监、普通年间萌发于宫廷的文学氛围——从文学场的角度加以审视。在这一过程中，主要着意于群体而非有代表性的个体，原因在于群体往往比个人拥有更大的包容度与可能性。实际上，群体与场域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群体是场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时，在这种总括性的视角下，通过辨别该场域中的关键人物与次要人物，并对他们的文学活动作分析，即可较为清晰地追溯梳理出其中文学圈子、文学风气、文学潮流的形成脉络，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时代的共同点。

该著营造的空间场域呈双层嵌套模式。著者将视角聚焦于萧统的成长环境东宫，在对这一空间进行审视时，一方面将其作为客观地理环境，考察了该地在地理意义、人文意义上的双重“营建”；另一方面，东宫这一空间场域也等同于由萧统及其师友构成的文学群体。在此基础上将视野拓宽至整个梁代的文化环境，尤其突出了萧统与其父萧衍在观念上的种种碰撞，将二者间矛盾的形成、激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放置在梁代的大环境中进行整体考察。当场域作为研究进行的背景得到构建后，与此相关的其他细节要素也逐渐得到彰显。

总而言之，上述讨论与分析均建立在将一切都放在“南方的一个具体空间”这一基础上，群体的活动构成场域，场域对群体产生反作用，二者相辅相成。著者通过分析以萧统为代表的文学风范，间接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温柔敦厚的诗教之风，并通过对典型作家的文学质量、个人修养、政治行为等方面进行综合探究，指出梁朝作家远非举止轻浮或道德败坏，而是努力做到平衡、优雅。结合历史记载，重新对梁、南朝现有的文学叙述进行阐释。

上述著作采用的空间研究视角并非独辟蹊径。《中国文学景观中的邺城》的作者曹中玉师从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其师在该书系中同样参与写作，著有《刘骏宫廷中的文学关系》（*Shen Who Couldn't Write: Literary Relationships at the Court of Liu Jun*）一文，该文章收录于《阅读中古中国诗歌：文本，语境和文化》（*Reading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Text, Context, and Culture*）一书。《宫廷写作时代：文选编纂者萧统和他的圈子》作者王平师从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其师在同一部论文集中撰文《中古中国文学中的废墟与记忆》（*Ruin and Remembrance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u on the Ruined City" by Bao Zhao*）一篇。上述两篇文章中同样渗透着空间场域学的要素，其着眼点不仅落在中古诗歌，还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拓宽视野，更广泛地对纯文学发生的场域进行考察。无独有偶，空间研究这一方法论同样出现于其他地区的汉学研究当中。如北美《唐研究》期刊（*T'ang Studies*）于2003年刊载康达维《甜橘或南金？——西晋文学中的地域认同》（*Sweet-peel Orange or Southern Gold?: Regional Identity in Western Jin Literature*）一文，以及王平、魏宁编辑的《中古诗歌中的南方认同与疏离》（*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一书，均将文学写作放置于特定的场域中加以观照。此时“场域”兼有人文与地理两种内涵，从而形成双重构造。上述学术成果可以形成两两交叉的对应关系，学者们为进行文学研究而构建出的场域分为两类——由群体构成的人文场域与基于地理要素的空间——成为空间场域学研究的基本分类，所有涉及该要素的空间构成都不超出二者之外。

（二）主题研究（Thematic Studies）

主题研究是平行研究的一个分支，表现为对同一主题、母题、题材、形象、意象等的流变情况进行重点研究。其关注的对象并非零散的、孤立的文本，而是文本中相似要素之间的联系，包括前后呼应、相互影响等动态过程。主题研究始终是海内外学界热门的研究方法，多见于论集的编撰。

该书系中，《阅读中古中国诗歌：文本，语境和文化》（*Reading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Text, Context, and Culture*）论文集围绕中国中古诗歌进行了丰富的延展；尽管各章节的研究对象不尽相同，但对“中古”这一术语的扩展成为各章节共同作用下的成果之一。这些研究探讨了中古中国对诗歌的期望与解释，虽不能囊括中古诗歌的全貌，但其提出的九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批判方法、不同类型载体的诗歌观念却可以视作海外对中国中古诗歌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

方法的初步探索，对听觉元素及音韵学特征的重视也成为其慧眼独具的创新点所在。

《思考终结：中古早期中国诗歌呈现中的死亡》(*Considering the End: Mortali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Poetic Representation*)将各种意义上的“终结”作为中心话题，陈伟强考察了中国中古早期诗歌中的相关书写。同“未知生，焉知死”的传统观念相一致，中国国内学界关于死亡书写的 research 较为少见，但死亡书写本身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频主题，与该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紧密相连，互为表里，可谓是时代对群体的影响外化于诗歌的具象反映，因而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汉学学者在进行这一主题的研究时，通常将生死、创伤、记忆等要素联结贯通，更多从形而上学角度出发，思考永恒与衰朽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更偏向生死与哲学观念的映照。

该著亦将宗教角度作为切入文本的方式，将文学文本、宗教文本并举对照并进行综合化审定。当研究以诗人为中心展开时，阮籍、陶潜、谢灵运三人凭借其显著的个人特色而常常被选作研究对象。这种个人特色没有使其成为独立于时代环境的别调，反而赋予了他们特殊性与典型性，最终成为该时代在这一主题下的突出代表。当讨论围绕具体的文学内容进行时，临终诗作为一类诗歌的书写题材单独成章出现。顾名思义，“临终诗”即在对想象的、非自然的死亡的预期中写就的诗歌，特殊的时间节点使其往往蕴含着最真实的意识凝聚。在因政治环境不稳定而呈现出复杂性的文学作品中，不论是出于写作者的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的生存环境，“真实”流露较为困难，“渔夫”频频以写作者的代言人形象出现也说明了这一点。而渔樵代言模式存在着一个固有矛盾，当一个隐居的诗人试图通过写作来获得声名时，其“伪装”就会被移除，这种书面行为也随即自动成为他追求名利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该模式又额外地具有一种象征作用，“代言”发生在得到诗人认同的前提下，在诗中作为典故呈现出来。这种情况在那些临终的诗人——尤其是意外的非正常死亡——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上述种种文学塑造的最终结果是，被讨论的所有人物不论客观生死都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文本生命。

上述著作在体例上均属论文集，总体上运用了主题学研究，但由于该方法论结构的特殊性，各个章节之间又自成体系。而《“永明”：永明时代的三位诗人》(*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 Three Lyric Poets of the Yung-ming Era*)一书虽归属于同一方法论，却以该书系中唯一的诗歌译本形式存在。永明诗人与永明体诗歌是叙述的唯一中心，故亦可将其视为一种主题学研究，在整理、编排与翻译等客观行为之外，马瑞志也阐明了自己的初衷在于希望其提及的部分诗人所分享的一些理想和情感能够在翻译的创伤中幸存下来，从而使得他们为中国文学传统遗留下的遗产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为英诗读者所感知。通过对这些诗人诗作的梳理，著者为该年代澄清：

“这一时代绝不仅是汉朝和唐朝之间的混乱过渡。”除此之外，同样着眼于永明文学的吴妙慧所著《声色：永明时代的诗歌和宫廷文化》(*Sound and Sight: Poetry and Courtier Culture in the Yongming Era*)一书聚焦于诗歌写作的语言技巧和感知模式，将“声”与“色”两组基本概念

作为关键词，叩问永明诗人诗作中的听觉和视觉体验的究极内涵，挑战了单纯审视文本这一阅读中国古典诗歌的常见做法，其可被视作相同主题上的创新性延伸，同一主题，二书在不同的侧重点上进行发掘。该时代诗歌研究同样是中国国内学界较少提及的，其与上文萧统的文学场一样，从某种意义上均可划分入“宫廷文学”，这一标签也直接导致其虽作为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坐标却屡遭忽视。而海外学者因为地域有别带来的文本陌生性，致使其少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从而在对象的选择上能做到相对客观地去评判实际的文学标准与地位。这一根本差异也彰显出海外汉学研究的独特性。

（三）记忆学研究（Memory Studies）

记忆研究是莱顿汉学乃至整个海外汉学研究十分重视的主题之一，主要包括记忆、口述、接受与重建等要素。“记忆”的初创者、再创造者、再创造后的接受者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文本本身是为记忆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四大要素。文学本身拥有永恒的价值，于是记忆学研究往往将重点聚焦于特定文本在历史中的变迁过程，探究这种“永恒性”是如何通过上述行为产生的。“记忆”被定义为一种选择性主动重组的动态过程，即为了当前的某些目的而对过去的特定片段进行再创造，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元素均有可能被保留、重新排序或抑制。需要格外注意的是，记忆重构绝非都是正向的，也存在作者为特定目的而构造反记忆（counter-memories）的可能。

书中运用记忆学研究方法最为突出的是《中古中国的记忆》（*Memory in Medieval China: Text, Ritual, and Community*）一书。该著围绕记忆的构建展开，选取部分中国古典文学中关于记忆构建的典型案例，主要从以下四点切入：记忆构建如何产生、为什么目的而产生、此类记忆行为的目标受众是谁、读者怎样接受这种挪用。其中个案选取包括陆机《辩亡论》、江淹拟古诗、《礼记》与《世说新语》、中古早期中国的文学身份和文学记忆，以及中古早期宫体诗中对于创伤和暴力的书写，这些均带有鲜明的记忆重构痕迹。通过对各章节的论述过程进行综合考察，可以发现接受与重构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后时代的写作者必须首先完成对前时代作品的解读，在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此时，重构行为既可以是在认同态度下进行完全或部分的继承与挪用，也可以是基于否认态度而对原文本进行完全颠覆式的重新编码或直接构建反记忆。

后时代的写作者在进行再书写时通常具有无可比拟的自由性，其对于句法模板的联想记忆十分活跃，常从过去的作品中寻找灵感，并将自己的文学资源带入记忆当中，在模仿与创新中构建一个新的文本空间。后时代作家对前时代的作家作品往往持有优越的考察态度，通过细致分析，针对其如何消解词句、运用词句变化等进行细致考察，从而完成对先前作品的整体把握。但由于时代先后是无法改变的，在接受前时代文学遗产的同时，后时代的书写难免受到此前同类作品的影响，有时借鉴行为会悄无声息地发生，这也成为后时代的局限性之一。此外，前时代的低自由度还体现在其无法对后时代的改造作出反应。后时代写作者的认识多具选择性，其

拥有对所借鉴的东西进行改造的权利与自由。于是，被记忆者与其依靠的文化工具——记忆——之间便形成了一场积极的博弈。

接受研究是该书系中最为鲜明突出的特征之一，体现出海外学者对某一语汇在当代是如何形成与凝聚、在后代是如何延伸与演变等问题的高度关注，除了在《中古中国的记忆》一书中各个章节围绕记忆建构展开、通过不同的切入点针对这一重构行为进行剖析之外，《中国文学景观中的邺城》一书同样使用了这一方法论。在该著作中，曹中玉对于邺城这一文学主题、铜雀台这一比喻本体及其隐喻内涵的稳定与嬗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在对这类文学继承与重组行为进行考察的同时，学者们并不囿于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而是大胆向前追溯，对一条线索寻源讨本，将视域扩大至起于先秦、迄于六朝。通过这一努力，文本的迁移与读者的接受等过程清晰可辨，在跨时空维度中搭建起桥梁，这使得铭记与遗忘、接受与重塑在接受研究中微妙复杂的变化得到较为切近的归纳成为可能。

寻源讨本的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概念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其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一书中对记忆、身份认同以及文化的连续性作出了导其先路的阐释，认为对于文化记忆来说，重要的并非事实，而是记忆中的历史。在认同这一定义的基础上，柯马丁（Martin Kern）将其同早期中国的文学书写相结合，在《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诗学研究》（*Performance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Poetics*）书中诠释了这些文本是如何在一个与当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运作的，在这一过程中详细探讨了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形成。此外，他一并将口传与写本、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等纳入考虑，这些新材料的加入为探索记忆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与可能性。

（四）互文（Intertextuality Studies）

《模仿自我：江淹和中国诗学》（*Imitations of the Self: Jiang Yan and Chinese Poetics*）较多从互文的角度考察江淹拟古诗。该书同《中古中国的记忆》一书中田菱所著《互文性与中国中古早期的文化记忆》（*Intertextualit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Jiang Yan's Imitations of Nearly Lost and Lost Writers*）一文相互呼应，以六朝诗歌为背景展开，将江淹拟诗作为最具自我意识的互文性写作六朝拟诗的鲜明代表，以摹写总结改写，进行以拟诗为代表的文化解读。拟诗的最早动机之一在于修正和稳定早期文本，在诗歌本身的双声（double-voice）中寻找诗意的共鸣以及虚构的讲述者和隐含的书写者之间的距离。论著追溯这种双声在早期中古中国诗歌——特别是在江淹作品中——的发展，而拟诗则成为调查的起点，其不仅是诗歌研究的对象，也是对诗歌的批判性解读，为读者确定诗歌的体裁、风格和自我表现的模式。因此，拟诗研究对于六朝诗歌解读具有一定意义。

六朝拟诗是诗歌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和表达工具，“双声”于其中频现，这种文学现象

的发生得益于汉字的一致性，使得相隔千年的作品得以保持一种“表层连续”。双声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来说，它是那一时期审美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是一种可以从多角度欣赏或研究的多级诗歌结构；而消极的是，它至少包含了对自我的象征性压制，并被用作一种政治防御——防止敌人在自己的诗歌中找到迫害自己的素材。在跨越整个六朝的拟古诗中，魏宁选取江淹的作品作为切口，因其诗作在“六朝色彩”这一维度更具代表性：首先，通过各式模仿，江淹对各种风格进行了较广泛的尝试和探索，其作品成为该时代诗歌发展的“综述”；其次，江淹拟诗较之陆机拟古诗、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后者以各自方式传达出一种更为强烈的个人诗风，而江淹则传达出一种被包围的个性感，一种士大夫们必须通过间接手段和使用另类人物来写作的普遍心态。江淹拟诗及其作品中频现的双声现象，反映了六朝时期对于拟诗的关注与成就。

在方法论层面，互文成为其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互文”是一个中性词，概括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表现形式，文学的互文性研究即针对该文本与其他文学文本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研究。在该著的研究范围内，六朝拟古诗在创作过程中则更多是一种单向的模拟或接受，是将前时代诗歌作品作为“他者”后进行的互文性评论。在拟诗被创作出来之后，前时代被拟的诗歌与后时代新创的拟诗同样作为既定的文学文本被无差别地呈现在文学史上，此时二者的互动方才清晰可察，双向联系才得以构建。在拟诗的创作过程中，写作者将早期诗歌同自己的声音串联起来，对诗学传统进行整体反思，即“比古志以明今情”。在这种“模拟”的背景下，后时代写作者对诗歌本身进行了二次引用：新创的文学作品可能会受到当代的重视，但它不能取代作为其来源的原文本。江淹拟诗的特点是对这种二元性的明确而自觉的关注，即创造一个介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作者自我，这一点在整个六朝拟诗中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在互文性研究中，二者之“同”与二者之“异”是不可或缺的二元对立。“同”往往来自于拟古诗“模拟”的生产过程：模仿和再现不是对他们所描绘之物的重复，而是一种重写、反思和创造性解读，是对其本质的洞察，是一种普遍理解过程的具体实现。它以两种理解视界的融合为模型，在此意义上成为理解本身的一种艺术表现。总的来说，拟诗是作者对熟悉主题的新演绎，为当代读者赋予了新的意义。这种复杂的模拟反映了回归传统遗产的可能性，使“模拟”最终表现为一种历史孤立的主张（assertion of historical isolation）。

在互文之外，江淹拟诗同样涉及到记忆建构的问题。“拟诗”之“拟”是语篇回忆中最复杂的一种形式，像引用和用典一样，表达着对过去作家作品的敬意。在更实用的层面上，这些形式的记忆有助于保存过去，为一种文化保存信息，通过对过去作品和形式的复兴来抵消文化损失，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而“同”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在相同中表达了什么样的“异”。复活死者的行为既不是一个模拟的活动，也不是纯然无害的过程，被复活的“死者”永远不会和以前相同，因此，摹写作品中的再现与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记忆重构。作

为前时代的产物，作者已完全丧失对作品走向的主导权，于是后时代的接受过程也是一种选择性的重组过程，其针对前时代作品进行的种种行为，本质上是为满足当前的某些目的。结合当时混乱的时代背景可知，文人在更多情况下不具有直接表达自我的自由，不论是为避祸全身还是出于其他目的，“拟”是其不得不选择的创作途径；而正因为这种自由度的丧失，使得他们在进行模拟写作时必然会将属于“自我”的元素糅合其中，使拟诗成为一种覆有保护层的言志抒情文体，这也成为拟诗与原作最本质的不同之处。综上所述，探讨中国传统拟诗的该书既是一种诠释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历史现状的反思；正是得益于以互文视角进行探索与考察，中古早期中国作家“如何通过文本链将固有的文学资源改造成新形式、从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参与文化遗产的途径”这一过程才清晰可见。

三、莱顿汉学书系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学术特征及发展趋势

对于 Brill 而言，莱顿的汉学研究专著始终是其中国研究出版物目录中的重头戏。通过对对其进行上述归类与分析，我们可以获知以莱顿为代表的荷兰汉学研究的些许特征。该书系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最突出的偏好在于对文学活动中客观存在物的重视，例如文学发生的场域空间以及文学活动中的物质遗留等。在以物质为切口展开研究时，其较多使用物质提喻（synecdoche），即借事物本身所呈现的各种对应的现象来表现该事物，正如《中国文学景观中的邺城》一书中，作者重点讨论了用铜雀瓦制成的铜雀砚，通过后时代文人对这一小物的书写，追溯至曹魏与建安时期。在未来，莱顿汉学将更多地把中国研究作为一种区域研究——其追求学术更多的是地方、语言和立场问题。从总体上看，莱顿中国研究谱系的一部分是已有数百年历史传统的东方研究，核心在于古典人文学科领域，包括考古、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宗教等，另一部分在于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学科应用于“非西方数据”，主要目的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莱顿汉学界同亚洲研究的其他领域以及学科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2023年10月12日，Brill 与 De Gruyter 宣布合并，成立 De Gruyter Brill，二者均拥有深厚的学术传统，这一合并将使 De Gruyter Brill 成为人文学科领域领先的学术出版商，为今后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提供可能。Brill 同中国的交流同样值得留意，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其同北京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互动频繁。在荷兰汉学家——包括很多已经离开莱顿或阿姆斯特丹、现在任职于世界各地的学者们——持续的引荐下，近年来，中国学者的丛书或期刊在莱顿的编辑数量迅速增加，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旧保持该趋势，国内以莱顿丛书为观察对象的书评及学术文章也频频见刊，使得莱顿汉学研究的成果在中国推介渐见趋势。Brill 管理层与中国出版界、学术界之间的频繁互访使这种联系不断加强，逐渐缩小了文化与学术之间的差距。现如今，Brill 数字出版业务已然颇具规模，无论是在线网站 Brill

Online 亦或是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开发的“易阅通”平台均可实现全文访问。在此基础上还可展望未来数字出版领域的更多合作可能，例如建设更灵活的电子数据库，实现书系内部的精准检索、按照相关主题或断代进行书目的分类与集成等，这无疑会对从事相关研究时的参考与引用提供良多裨益。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同海外汉学家们各有不同的着力点，因此呈现出差异化的学术风格。随着时代的推进，双方亦都在秉持各自学术传统的同时，也在新时代呈现出诸多融合与新变。在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当下，对莱顿汉学书系保持关注意义匪浅。不同的文化背景能够对相同的文本与主题进行不同的诠释，而持续的交流与互动正使得学界对其视角、切入点、方法论等进行系统批判成为可能。不论如何，中国国内学界应在坚守文学本位立场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的态度对海外汉学研究之长处进行借鉴参考，与此同时坚持本土特色，将中国的文化遗产与新时代之研究放置于世界学术共同体的背景下，在积极的对话中对自我之传统做出诠释，并在这一过程中对“自我”与“他者”之差异进行合理反思，在碰撞中发现更多可能性，打开思路、革除宿弊，以更加开放的思想推动国内的魏晋六朝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 Assmann, J. (2011).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996306>
- Chan, T. (2012). *Considering the End: Mortali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Poetic Representation*.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229020>
- Idema, W. L. (2013).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263123>
- Kroll, P. W., Swartz, W., Cutter, R. J., Knechtges, D. R., Ding, X., Chan, T., Kroll, P. W., Owen, S., Egan, R., & Yu, P. (2014). *Reading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Text, Context, and Culture*.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282063>
- Mather, R. B. (2003). *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 Three Lyric Poets of the Yung-ming Era (483-493)*.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531765>
- Swartz, W. (2018). *Reading Philosophy, Writing Poetry: Intertextual Modes of Making Meaning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ttps://doi.org/10.1163/9781684170951>
- Swartz, W., Campany, R. F., Swartz, W., Goh, M. H., Chen, J., Wang, P., Tian, X. F., Nugent, C. M. B., Ditter, A. K., Allen, S. M., & Ashmore, R. (2018). *Memory in Medieval China: Text, Ritual, and Community*.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368637>
- Tsao, J. (2020). *The City of Ye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Landscape*.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20144>
- Wang, P. (2012). *The Age of Courtly Writing: Wen Xuan Compiler Xiao Tong (501-531) and His Circle*.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228252>
- Williams, N. M. (2014). *Imitations of the Self: Jiang Yan and Chinese Poetics*.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282452>

(责任编辑：石林雁、周睿)